

中国灵魂争夺战

习近平治下的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



目录

概述	1
总论	4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15
图表：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4
地图：各省宗教迫害情况	25
I. 汉传佛教和道教	26
II. 基督教	42
III. 伊斯兰教	66
IV. 藏传佛教	86
V. 法轮功	108
建议	130

关于作者

萨拉·库克是自由之家资深东亚研究分析员，为本项目主任以及报告作者。她主持《中国媒体快报》，每月一期，以中英文两种语言提供有关中国新闻和言论自由方面的新闻和分析。她还是两份自由之家特别报告的作者：《政治局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压制政策的局限性》（2015年），以及《中国审查制度的阴影：中共媒体管制如何影响全球新闻媒体》（2013年）。

研究、编辑和顾问团队

五名精通中国宗教群体的专家（三名博士候选人、一名独立研究员、和一名记者）为本报告的五个章节提供了研究支持，但他们希望保持匿名。Tyler Roylance (自由之家编辑), Annie Boyajian (自由之家倡议负责人), 以及实习生Bochen Han 与 Cathy Zhang 提供了编辑和研究协助。三名希望匿名的中国研究学者担任了学术顾问。

致谢

本报告因为得到了Lynde and Harry Bradley Foundation 的慷慨支持才有可能完成。特别感谢Arch Puddington, Daniel Calingaert, 和 Robert Ruby提供意见和反馈。Garry Fey 担纲图像设计师。

封面说明

在2016年2月藏历新年期间，大量中国军人在甘肃省拉卜楞寺外聚集，防止抗争爆发。(Christophe Boisvieux/Getty Images)。

概述

中国灵魂争夺战

一个加入了道教的学生不知道何时能被接纳为道士。几十名基督徒被禁止庆祝圣诞节。藏人喇嘛在“爱国再教育”学习班被迫学习重新解释佛教教义。一名维吾尔农民因为在野外祈祷而被判九年徒刑。东北一名四十五岁的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拘留几天后死于看守所。

这几个例子显示了中国的信徒们在寻求和平地实践其信仰时所遭遇的障碍，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多方位控制的结果。通过暴力和非暴力方法，共产党的政策旨在限制信仰群体的快速增长，根除某些信仰和修行，但同时又利用宗教的某些特点，为政权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

自从习近平2012年11月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当局加强了对宗教的限制，宗教迫害整体来说趋于上升。但是信仰者的抵制程度令人意外，包括一些一直以来与党和政府官员保持着合作关系的信仰群体。

自从习近平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宗教迫害整体来说趋于上升。

不断升级的打压以及抵抗显示了中国当局宗教政策根本上的失败。这些打压不仅没有能够阻止宗教的自然扩展，并将其置于政治控制下，共产党严厉的控制措施反而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黑市，强迫很多信仰者法外运作，并视中共政权为一个不讲理、不公正或不合法政权。

本研究报告详细考察当今中国宗教复兴、打压和抵抗的动态，它们最新的变化以及更加广泛的意义和影响。这份报告着重考虑七个宗教群体、涉及共三亿五千多万信仰者：它们是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佛教（中国佛教和藏传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以及被取缔的法轮功。法轮功是被禁止的几个气功修炼者群体、新宗教运动以及半基督教群体中最大的一支。

不管是哪个宗教，中国正在经历一个精神复兴。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控制则依据地点、民族、与教派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形式。在许多地方，普通的信仰者并不一定感到他们从事宗教活动的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当局甚至对某些活动提供积极支持。

在另一个极端，中国官员禁止信仰者庆祝节日，破坏敬拜场所，使用致命的暴力。在全国不同地方，安全力量逮捕、酷刑或杀害各种信仰者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一个群体或个人受到什么对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党视他们为多大的威胁、或者对党的利益有什么好处，但也取决于当地官员的态度。

非暴力形式的控制更为普遍，但是对许多信仰者来说，这样的控制仍然非常令人反感，直接侵犯宗教组织的内部功能。这包括对宗教领导人进行审查过滤，看他们是否政治上可靠；对新的寺院或神职人员的人数进行限制；根据党的需要对宗教教义进行操纵等。对私人敬拜进行的深入监视、“再教育”运动、以及对私人敬拜的限制影响了数以百万计人口的精神生活。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经济报复和盘剥导致紧张气氛，并催化抗议。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政府扩大了许多这样的做法。原来非正式的限制现在变成了法律。对未注册、或甚至国家承认的敬拜场所与宗教领导人的打压有增无减，好几位神职人员被判处很长的监狱刑期。对儿童参与宗教生活的限制变本加厉。本报告中所考察的宗教群体中，有四个群体所经历的迫害更加严重：新教基督徒、藏人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和回穆斯林。

然而，在令人意外的地方也出现了一些正面的变化。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回暖，中梵有可能就任命天主教主教达成协议。这样一个协议将移除中国教会中一个主要的争议来源。法轮功学员尽管仍然受到严重迫害，但是在许多地方，随着一些主导迫害法轮功的官员在党内斗争中遭到清洗，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有所缓和。另外，法轮功学员及其支持者在草根阶层多年不懈地与低层官员接触，也转变了后者当中一些人对法轮功的态度。

共产党将其控制强加于各种信仰和理论之上的努力在重要的方面难以成功，或适得其反。

所有信仰群体的成员在应对官方的控制时都显示出了创造性和勇气，有时还获得相当瞩目的胜利。不管每次较量的结果如何，显然的一点是，共产党将其控制强加于各种信仰和理论之上的努力在重要的方面难以成功，或适得其反。

共产党投入了大量资源试图消灭的宗教组织、信仰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获得了更大的传播。这标志者共产党在打压能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失败。与此同时，官方的行动在信仰群体中激发了怨气、不服、和倡导活动，而这些人本来不带政治色彩，对共产党统治也基本上满意。

这些动态和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宗教政策范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总体上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环境。放眼未来，习近平和他的同僚面临一个重大选择：他们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放松宗教控制呢，还是继续强力推动这个对政权的长远合法性和稳定性构成威胁的打压和抵抗模式？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精神之战的最终代价如何，将取决于中共领导人的决定。

几千年以来宗教和精神深刻地存在于中国文化和身份认同中。这个事实对1949年掌握权力、并誓言为无神论者的中国共产党构成一个挑战。在执政几十年里，它对待宗教的策略起伏跌宕。

总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宗教现实的交锋

在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76年），共产党采取了极端措施消灭宗教。成千上万的寺院、教堂、清真寺被毁灭，和尚被还俗，难以数计的宗教领导人和信仰者被投入监狱、遭到酷刑、被杀害。

毛泽东去世后，1982年，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拒绝了文革时期消灭宗教的政策。³相反，它寻求通过管制去管理宗教，利用宗教的影响力去达到党的其它目标，同时压制宗教对党的权威可能构成的任何威胁。这一做法的背景是马克思主义的假定，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封建”宗教思想必将消失。

“[共产党员要做]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团结引导宗教界和广大信教群众。”

—习近平，2016年4月¹

“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老子，道教创始人²

然而三十五年过去后的今天，共产党领导人面临一个难题：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预言被证明十分不准确。尽管自19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以及人均收入取得了爆发性增长，宗教在中国社会并没有消失。相反，各个宗教都在经历不同寻常的复兴和扩大。今天，中国有至少三亿五千万信仰者，另外成千上万的人从事不同形式的心祷活动与民间宗教仪式。许多信仰者说，他们寻求属灵的慰藉和引导，以便应对超物质主义现代环境下的生活。

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采取了管制、适应、和压制相结合的手段对这个难题做出回应。2012年上任的习近平以及他领导的本届中共中央常委会也不例外。事实上，从他的言论和行为看，习近平提高了“宗教工作”在党的议程上的位置和重要性。⁴

本报告研究这些动态变化，它们对理解当今中国至关重要。本报告评估宗教复兴的状况，当局控制宗教的多方面做法，以及宗教群体的各种反应。本报告尤其着重于习近平上台头四年的做法，所研究的对象则包括七个主要的宗教群体：佛教、道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藏传佛教、和法轮功。本报告试图帮助理解以下问题：⁵

- 在今天的中国，精神领导人和信仰者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和机会是什么？
- 自从2012年以来，党国宗教政策、管控方法、实施情况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
- 哪些因素在驱动这些变化，在应对每个宗教群体时，共产党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达到

江苏省一个景区内的寺庙上挂着的横幅：“学习、宣传、贯彻宗教法规规章，维护宗教和睦，促进社会和谐！”

图片来源：Kuei-min Chang



了它的目的？

- 这些动态对中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化带来了什么影响？

在准备这份报道的过程中，自由之家的分析员考察了数百份官方文件和讲话、法庭判决书、媒体报道、以及学者、智库和人权组织的研究，有中文

的，有英文的。分析员还对中国境内外大约三十名律师、宗教领导人、和尚/喇嘛、草根活动者、评论人士、以及学者进行了访谈。我们还吸取了参与本报告撰写的研究人员和学术顾问在中国境内所做的田野观察。⁶

中国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支柱

随着中共领导人接受了宗教在中国社会持续存在并明显扩大这个事实，他们制订了复杂的政策，旨在最大限度地为共产党统治谋取利益，同时把威胁压至最小。从实施情况看，这个战略有四大支柱：

- 机会主义的利用：收获宗教的好处，为推进中共更广泛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服务
- ‘依法治国’：建立法律和官僚建构来控制宗教行为和宗教机构
- 有选择性地消灭：严厉打击那些被认为威胁党的统治或重大政策的宗教群体、信仰和个人，通常是通过法外途径这样做
- 长期遏制：采取措施控制宗教的扩大，加速其在年轻一代中的绝灭

它寻求通过管制去管理宗教，利用宗教的影响力去达到党的其它目标，同时压制宗教对党的权威可能构成的任何威胁。

共产党当局针对不同的宗教群体和下属群体，结合以上这些基本元素，给不同的信仰群体制造不同的环境，导致看似矛盾的政府行为。一方面，党的领导人经常指出宗教在社会中能够起积极的作用，鼓励慈善工作，提供资金对重要的朝拜地、旅游点进行修新，还为相关国际会议提供资助。另一方面，政府又通过一个具有巨大经费的官僚和安全机器监视和压制在世界其它地方被认为无害处且正常的范围广泛的宗教活动，有时他们通过野蛮武力这样做。

每一届中共领导人都遵循了这个总体做法，只是着重点和实施上有所不同。江泽民在讲话中曾强调宗教对实现共产党社会和经济目标“潜在”的积极贡献。但是在1999年，他发起了一个学者所称的“文革以来最恶劣的宗教迫害事件”⁷，即对很受大众欢迎的法轮功的大规模灭绝。

江泽民的继任者胡锦涛视政府许可的宗教为促进“和谐社会”的一个方法。在他的任期期间，政府开始为世界佛教论坛提供资助，推广中国的“软实力”，同时很多地方官员对宗教扩展采取了柔和态度，或寻求从中获得经济好处，很多新教堂和回族清真寺得以修建。但是胡锦涛任期内也对宗教事务采取了全国性的限制措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对成千上万信仰者进行了打压，在西藏和新疆发生重大抗议活动后进行了严厉镇压。

习近平治下的轨迹：强化限制， 出人意外的改善

从2012年至今，习近平和他的同僚基本上保持了共产党对宗教的立场，继续了前任的一些具体措施。然而，某些特点和着重点在这些年里浮现出来。

从修辞上来看，习近平比他的前任胡锦涛更强调要通过中国的宗教和传统文化来支撑共产党的合法性，将这两者与他的“中国梦”概念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他又展开了一场意识形态运动，限制所谓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警告外国势力在宗教领域的渗透。这两个讯息更强化了人们的一个印象，即共产党更倾向于诸如佛教和道教这样的亚洲宗教，尤其是当它们的扩展可能有助于制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时。共产党对这后两种宗教更加心怀戒备。

习近平还对中国的公民社会采取了关闭政策，宗教组织也未能逃避这个整体上的打压趋势。的确，本报告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宗教迫害整体上有所增加，四个宗教群体经历了这个迫害：新教基督徒、藏传佛教、回教穆斯林和维吾尔穆斯林。

与胡锦涛时代相比，习近平治下的宗教政策有以下四个不同：

- **限制性更强、更加严厉的法律环境：**中国在国家 and 地方层面通过了一系列新的、限制性的法律，在有些情况下将原来非正式的政治指令法律化。这包括直接与宗教政策相关的规定，如对全国宗教事务规定的更新、在刑法一个关键条文中规定更加严酷的惩罚、在新疆禁止宗教服装、在西藏处理自焚事件的司法方针。新的国家安全法和反恐法中也加入了能够被用来压制和平宗教活动的条款。
- **扩大打压目标：**与胡锦涛时代相比，宗教迫害的目标扩大了，原来受到容忍的活动和个人现在不再被容忍。最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扶植的宗教领导人和敬拜场所也面临惩罚，包括被判重刑以及被拆毁。而这些做法以前只发生在未登记的或被取缔的宗教组织身上。日常的宗教表达，如在户外或医院敬拜、烧香、或观看宗教录像都招致严厉的惩罚。打压还发生在原先少见打压的地理区域，或针对那些向受迫害的信仰者伸出援手的人，如人权律师和家庭成员。
- **国家机器更多地干预日常宗教生活：**在以前没有感觉的地方，现在在某些宗教活动中以及宗教身份中能感到国家机器的控制。党的干部和包括武装警察在内的安全力量在某些地区更直接地介入了寺庙、清真寺和教堂的日常管理，一些更是永久性地进驻敬拜场所。对普通信仰者来说，大众节日被禁止，儿童宗教教育和参与受到限制，诸如穿戴头巾、留胡子、或禁食这样十分个人的决定受到当局的命令干预。
- **适应新的技术环境：**从录像头、无人飞行器，到网络监控，各种



2012年，新疆乌鲁木齐一辆带有监控设备的警察面包车停在一个清真寺外。

图片来源：Graham Adams

形式的电子监控方法被戏剧性地扩大到了敬拜场所以及信仰者常去的公共场所，在巨大的告发人网络之外，提供更多监控信息。随着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应用的增加，当局的应对措施包括对特定应用进行定点阻断、囚禁在QQ或微信上分享宗教内容的用户、对仅仅是下载非官方宗教内容或下载有关违反宗教权利信息的信仰者进行迫害。

尽管总体环境趋于收紧，但是一些信仰群体中出现的现象令人乐观，这反映了中国政治环境的复杂性。一些佛教学者对习近平强调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他对佛教的一些具体言论表示欢迎。在习近平成为国家主席后不久，方济各教皇登基，从那时以来，北京与梵蒂冈的关系大大升温。在2016年底，双方似乎非常接近于达成一个关于主教任命的协议，尽管一些天主教重要人物对这样一个协议在多大程度上会缓和中共对“地下”天主教徒的迫害表示怀疑。

更加令人意外的是，对法轮功的打压在一些地方似乎有所缓和，特别是考虑到共产党过去17年来一直没有停止消灭法轮功的努力。习近平没有做出明确信号表示他打算改变共产党对法轮功的态度，但党内斗争的隙缝看来给了低层官员一些空间，使得他们可以选择不对法轮功成员进行迫害。有些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留几天后便获得释放，警察允许法轮功学员在囚禁期间打坐，或者警察积极保护学员不受惩罚，这些事情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却出现在中国不同地方，看上去不像是孤立事件。

驱动改变的因素

不管是好是坏，看来一系列因素在驱动这些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变化。在共产党总体上钳紧对公民社会控制、习近平反西方意识形态越来越凸显的情况下，宗教群体也受到了牵连。共产党在为经济下滑的政治影响做准备，同时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新的宗教限制带有习近平治国的印记，包括“依法治国”，强调立法，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扩大党的代表，以及强力打压社交媒体活动。

与此同时，政府的某些项目似乎是针对特定宗教群体而发起的。司法方针和集体惩罚措施被用来压制藏人自焚事件。在其它表达途径被阻断的情况下，藏人使用这种尤其绝望的抗议形式来表达不满，自焚在2012年达到高峰。对回族和维吾尔穆斯林的限制似乎来自于对越来越多的暴力攻击以及极端保守的伊斯兰原教主义的传播，还有中国公众当中越来越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当法轮功学员发明了传播法轮功信息以及受迫害情况的新办法时，当局试图加强电子监控、部署定位能力来找到并逮捕他们。

基督教的情况，个体官员的特点和考虑似乎特别有影响。浙江省书记过去曾与习近平一道工作，据说对公共场所过分显眼的基督教标记非常反感。他在浙江省领导了一个大规模的拆十字架运动，一千五百多教堂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新教皇来自发展中国家以及他的耶稣会背景，中共更愿意跟他对话，为主教任命协议扫清道路。从梵蒂冈的角度看，在中国，天主教主教空位之多前所未有，这也许促使方济各教皇向习近平做出他特有的姿态。

党内斗争平添另一层复杂性。党的干部要求采取更加强调同化的民族政策，那些主张相对文化自治的干部受到排挤，对藏传佛教和伊斯兰的限制更加严厉。在积极的一面，随着前政法委员周永康以及其他负责打击法轮功的官员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遭到清洗和监禁，对法轮功的打击在官僚领导层面的出现空隙，为抱同情态度的地方官员采取比较宽松的做法制造了空间。地方领导人同样也显示了对其它宗教群体的宽容，这常常是在与当地寺庙、教会、或清真寺领导人建立了合作关系之后。如此，政策执行显示出有紧有松的局面。

但是，共产党专制统治有几个长久的特点，所有官员在计算处理宗教事务或一个具体事件的代价和好处时都会受到它们影响。一般来说，他们倾向于打压而不是更加进步的政策选项。共产

图1: 宗教迫害的轻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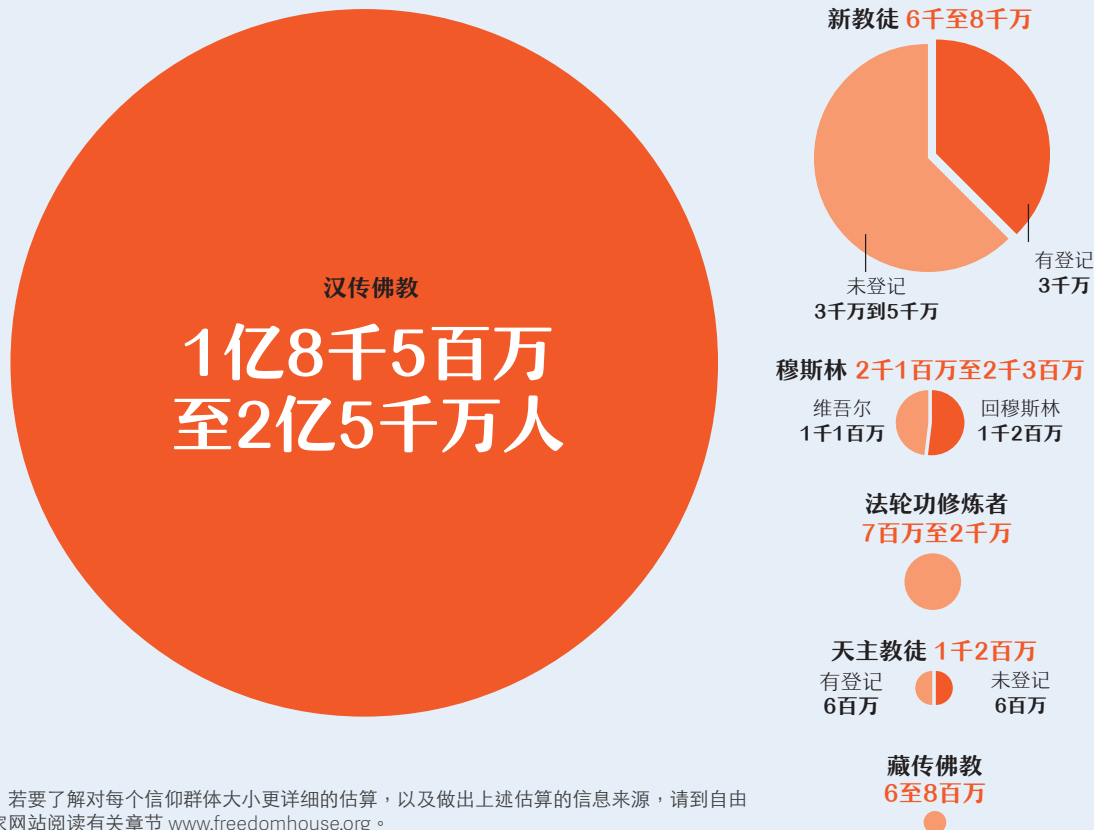


注：自由之家研究人员和学术顾问根据本报告对每个群体的描述、以及第16页关键宗教控制一览表所提供的分项指标，而对各宗教群体受迫害的程度做了如此评估。

图2: 中国宗教群体:

中国有3亿5千万以上的宗教信仰者，另有数以亿计的人信奉不同的民间传统。要决定中国各宗教群体的人数是非常困难的，即使受官方认可的宗教也是如此。政府统计排除那些在没有登记过的寺庙或教堂敬拜的人以及18岁以下的信仰者，许多中国人混合宗教与民间信仰。官方提供的穆斯林人数和藏传佛教人数是根据该民族人口数而做出的，其隐含的假设是，一个民族所有的成员都信奉一个特定宗教。对被查禁的群体，如法轮功，官方则无现有统计数字。

然而，对宗教信仰者整体以及每个群体相对大小有一些粗略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我们理解宗教复兴、压制、和抵抗的性质。以下是根据官方数字、民意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以及宗教群体自己的统计，而对本报告中所涉及宗教群体的合理估计（道教除外，无现有统计存在）。



注：若要了解对每个信仰群体大小更详细的估算，以及做出上述估算的信息来源，请到自由之家网站阅读有关章节 www.freedomhouse.org。

在北京家庭教会守望教会2009年被从敬拜场所驱赶后，一名妇女在一次户外敬拜中唱圣歌。在官方多年的骚扰后，守望教会于2016年解散。

图片来源: Beijing resident



党对信仰者忠实于它控制外的一个权威深感焦虑。当一个特定的信仰或一套做法变得十分受欢迎时，常常就会引发官方的打击，对新教教会更严厉的限制以及对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强拆就体现了这一点。不管是党内提升的正式评判标准，还是对党所排斥的东西进行镇压而不受惩罚这个事实，党内总的来说奖励打压行为，对违反宗教自由的党国机器赋予权力。最后一点，共产党长期以来在纪念敏感周年日或北京主办国际活动的时候调动安全力量，导致他们采取极端措施防止他们认为会损害共产党声望的宗教表达。

共产党政策的作用以及限制

共产党的宗教控制机器以及从2012底以来的压制行为在许多方面非常有效。藏人自焚得到了遏制。在浙江省，教堂上的十字架不见了。受到骚扰的家庭教会被迫分散。在公共场所戴头巾的维吾尔妇女和留长胡子的维吾尔男子少多了。

一批在政治上忠实于共产党的宗教领导人得到树立，新一代在官方办的神学院和佛学院接受训练。不少信仰者感到他们从事宗教活动没有障碍。作为政府“软实力”的一个胜利，中国2014年第一次主办了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际佛教组织的会议。

但是即使不同的管控措施和强化打压取得了实效，共产党仍面临严重的政策失败，其战略的有效性面临限制。在花费了数以亿计的资金以及摧毁了难以数计的信仰者的个人生活后，党试图改变人民信仰的努力总体上来说没有奏效。

许多藏人继续尊奉达赖喇嘛。维吾尔人在斋月期间仍然禁食、仍然教他们的孩子背诵可兰经、仍然前往麦加朝觐。在全国各地，基督徒继续在地下“家庭教会”敬拜。成千上万中国人仍然练习法轮功，众多法轮功学员据说撤回了他们在酷刑下被逼迫做出的放弃法轮功的声明。

事实上，共产党宗教政策的问题不仅仅是效用差的问题。政府故意为培训正式教牧人员制造瓶

颈，禁止无害的敬拜活动，对官方认可的教会领导人进行更多的骚扰，惩罚那些试图采取和解姿态的喇嘛。这些行为看起来适得其反，把更多的信仰者驱赶到非官方认可的聚会，表明与官员建立合作关系不是有用的做法。非政治化的信仰者被迫在法律之外从事信仰活动，这使得很多人得出结论说，政府及其规定是不公正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在这样的环境下，宗教领导人和信仰者在体制内寻求隙缝，扩大宗教实践的空间，抵制官方禁令，或明确反对打压性政策。

数以百万计的信仰者在日常生活中不理睬官方的限制，有些公开这样做，另一些人则秘密地这样做。宗教慈善组织的工作人员和自愿者把宗教象征和精神意义带入了在正式敬拜场所之外进行的活动。维吾尔穆斯林挂深色窗帘，以防止斋月期间被看见在日出前进食。藏人为达赖喇嘛祈祷长寿。法轮功学员在家里戴着耳机，坐在黑暗中打坐。对领导力培训感兴趣的基督徒从香港电台节目中或隐蔽在山中的私人工作室获得帮助。很多信仰者通过互联网、手机、地下出版物、自制DVD、以及卫星接收装置接触或传播非官方认可的信仰文本。

越来越普遍的一种抵抗形式是不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藏人寺院中的喇嘛拒绝出席“爱国教育”班，或逃进山里。其他参加政治培训的人则假装参与，同时却阅读他们自己带去的东西。天主教神学学生抵制他们自己的毕业典礼仪式，以避免与共产党扶持的、不具合法性的主角一起做弥撒。维吾尔人把政府的一些文件或政府主办的一些庆祝活动视为伊斯兰中的禁忌之物。诸如这些行为都有被惩罚的危险，但是许多信仰者仍然这样做。

就一些群体和一些问题而言，通过现有的政治-法律体系倡导改变是一个选项。道教组织不久前赢得了一个反对将一个圣人商品化的诉讼，回族穆斯林试图推动一项关于清真食品的立法。在其它案例中，宗教领导人和信仰者通过不同途径获得了地方官员的合作或默认。佛教寺庙领导人成功地通过论辩和公共施压，与当地政府谈判，保证了寺庙的开放，降低了门票价格，阻止了拆毁、或者和尚对寺庙收入获得了更大的管理权。

一些未经登记过的教会领导人在举行活动的时候预先通知当地政府，或者向负责监控他们的当地警察释放善意。这样做的结果是，官员对他们辖区内的“家庭教会”给予默许，警察预先通知教会领导人即将到来的搜查。中国境内外的法轮功成员在一个齐心协力的行动中，与成千上万法官、检察官、和公安人员联系，揭露共产党宣传的不实之词，鼓励他们不要参与对无辜者的迫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巨大努力带来了成效，一些地方警察拒绝监禁法轮功学员，2015年一个法官在一个法轮功案例中做了事实上的无罪宣判。这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例这样的案例。

很多信仰者越来越对政府的政策不满，表现得越来越不服从。本报告所考察的几乎每个宗教群体内的成员，包括一些“爱国”宗教协会的领导人，都进行了某种形式的直接抗议。在好几次情形中，佛教和尚向来访者关闭大门，试图反抗政府的一项新的商业化项目。在浙江省，来自官方认可教会的新教和天主教领导人发表了公开信，敦促政府结束拆十字架和拆教堂行为，他们的信徒则静坐抗议，或形成“人墙”来阻止对他们教堂的破坏。

在西藏，单独一人的抗议者举着达赖喇嘛的画像从市场走过，数百人不顾政府禁令而纪念死于监狱的一名重要的喇嘛。大批法轮功酷刑幸存者利用司法规定中的一个变化，直接在中国境内对领导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提起刑事诉讼。

共产党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是却没有能够去除一些宗教群体、信仰、或某些具体的教义，这本身令人印象深刻。这反映了有些公民愿意为更高的原则和精神救赎做出牺牲，党在打压这些公民时遇到了特殊的困难。

2014年3月的一天，卞小辉站在河北一所监狱外拉横幅：“我要见父亲”。她的父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拘押。卞小辉不是个法轮功修炼者，但是这幅照片在网络流传后，她被判处三年徒刑。

图片来源：《大纪元》



一些这样的努力迫使政府作出了让步或导致了其它实际改变，尽管许多从事抗议活动或散布被禁信息的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强拆得到了阻止，被关押信徒获得释放，政府的抹黑宣传被戳穿。

也许这些行动总体上最大的成就就在于他们所展示出的精神韧性。共产党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但是没有能够去除一些宗教群体、信仰、或某些具体的教义，这本身令人印象深刻。这反映了有些公民愿意为更高的原则和精神救赎做出牺牲，党在打压这些公民时遇到了特殊的困难。

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共产党管控和施虐的人类代价非常巨大。宗教犯人是中國良心犯中人数最大的一群。每一天都有更多中国公民因为从事和平宗教活动而被扫进党国的专政机器。家庭被分离，信仰者受到身体和心理伤害，有时失去生命。在中国有些地方，如新疆、浙江和黑龙江，对信仰

的高强度迫害涉及多个信仰群体，警察和法官被要求打击几个信仰群体的人。

考虑到直接受影响的人数之多、地理分布之广、以及他们的社会经济多样化，这些违反人权的行为在这些群体当中、在中国社会整体、在共产党当中产生了极大的涟漪效应。这表现为下列几个方面：

- **加速系统分化：**大规模宗教迫害强化中国司法、执法机器最坏的倾向 - 酷刑、免责、腐败以及司法政治化 - 损害任何建立真正法制的努力。它还加强国家机器内部的强硬派分子，保证他们的资源，为完善审查、“再教育”、恶行做法提供机会，而这些手法又被用于对其它宗教群体和世俗活动人士进行迫害。
- **加重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对日常普通的精神活动进行宗教管控会使得信仰者激进化，导致更多的人从事直接抗议、参与非官方许可的聚会，或分享被禁信息。有些人甚至针对包括与政府合作的宗教领导人在内的权威象征或平民进行暴力攻击。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新疆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所声称的宗教事务目标及其更广泛的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都受到了威胁。
- **失去的精神与经济机会：**对宗教群体、个体领导人以及精神教义的打压，包括试图剥除官方认可宗教的重大神学教义，无异于剥夺中国人以及世界有价值的文化与精神资源，同时损害中国实现其“软实力”潜力。更实际一些，浪费在既无效益且适得其反的宗教迫害上的钱是纳税人的钱，本可以用于对中国社会有益的事情上，如照顾老人，保护环境。
- **损害共产党的合法性：**随着宗教压迫范围的扩大，包括更多官方认可的宗教群体成员，这些人对政府的信任似乎正在下降。当非信仰者有机会看透欺骗性的政府宣传是在支持压制政策

时，他们对党的信念也会遭到实质上的动摇。党国机器内部的一些个人对参与迫害显然是无辜的人似乎感到日益不安，导致内在的抵触以及暗助那些受打击的信仰者。

这几点突出显示了共产党宗教政策在一些关键方面的失败，衡量的标准是它们并没有帮助实现党的目标和重点，尽管有些政策在其它方面取得了成功。失败的根源在于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中国的刚性、不合时代性的政治体系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都无法治理一个迅速现代化、多样化的社会，无法通过有益而人性的方式解决这个社会所带来的挑战。相反，政府继续使用一贯的压制工具，重复一个暴力和抵抗的恶性循环。

未来展望

习近平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如果希望从政策失败中解脱出来的话，他们有不少选择。他们可以放松有关宗教群体登记的规定，把更多信仰者带入一个现实的法律框架中，尽管这也许意味着允许登记过的群体在“爱国”协会框架外运作。他们可以扭转过去那些令信仰者非常反感、并损害了共产党合法性的任意做法，如禁止敬拜达赖喇嘛、禁止法轮功、拆除官方认可教堂的十字架等。在迫害维吾尔穆斯林的时候，他们应该区分和平的宗教活动与暴力活动。这样的步骤会在多个信仰群体中产生相当大的善意，但又不会对共产党保护其它核心利益有重大妨碍。

不幸的是，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这些选择似乎都不太可能。从这份报告的结论看，在未来几年，中国的宗教政策不会出现从上至下的松绑，尽管因为一些其它原因，某些宗教群体可能会享受更加有利的条件。这份报告凸显在地方层面，自下而上的力量和地理多样化对保护宗教信仰者的生命、扩大宗教活动空间、培养有益的政府-宗教关系上起着关键作用。

考虑到宗教复兴的趋势以及信仰者所体现出来的坚韧，从长远看，在对中国灵魂的争夺战中，不加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委最终将会失败。

从长远看，在对中国灵魂的争夺战中，不加改革的中国共产党委最终将会失败。

变化中的宗教控制和迫害机制

尽管中国政府使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信仰，但是本报告在对多个群体的考察中看到有些控制方法具有共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国机器的四个方面、它们近来的变化对普通中国人造成的深刻影响，同时它们也使得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当局如何与信仰群体互动：

1. 扩大对宗教领导人和敬拜场所的控制

在中国，五个官方认可的宗教都有自上而下的“爱国”协会，构成共产党对宗教进行建制性控制的基础。这些机构由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SARA)以及党的统战部监督和领导。五大协会分别是：中国佛教协会(BAC)、中国道教协会(CTA)、天主教爱国协会(CPA)、新教三自爱国运动(TSPM)、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IAC)。党国试图通过这五个协会以及各级宗教事务局(RABs)而对宗教活动进行全面控制。敬拜场所受到登记，宗教领导人受到监视，神学内容遭到控制，年度宗教庆祝活动或诸如麦加朝圣这样的朝圣活动都由官方组织。随着宗教信仰者人数在中国迅速增加，这些机构越来越难以达到它们希望达到的控制水平，有时则是出于自我限制。这导致更多粗鲁的官僚干预。

当局还没有对监管框架做出充分的调整来满足大众对宗教领导越来越大的需求。

这些爱国协会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负责遴选和培养政治上忠诚于共产党的神职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继续教育。根据官方讲话，共产党希望通过控制宗教组织领导人，把信仰者导向政治上忠于党的神职人员，确保宗教教诲不会损害共产党的合法性或政策。属于爱国协会的宗教领导人常常需要为共产党的政策说话，甚至帮助将共产党对其他信仰者的迫害合法化。

然而，当局还没有对监管框架做出充分的调整来满足大众对宗教领导越来越大的需求，即使受官方推崇的中国佛教和道教也不例外。中国当局继续对宗教教育进行严格的数量限制，只任命极少的道教教士，对具体寺庙能接收多少和尚学习做出上限限制，基督教神学院的空位不够充分。其结果是，很多信仰者不得不通过法外渠道进行学习。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受到官方认可的神职人员都是党的传声筒。一些官方认可的神职人员受到信徒的尊重，因为他们不仅有知识，而且试图在体制内捍卫信徒的利益。在为数不少的案例中，党所栽培的忠实领导人、“模范”因为信仰的指引或政府一些压迫行为而“反水”，使他们认为无法在不背叛良知的情况下扮演党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当局的反应总是解除这些本来受到官方认可的神职人员的职务，甚至关押他们。最近几年出现的例子包括天主教马德钦主教和新教顾约瑟牧师。

有迹象表明中国当局正在快速跳过宗教中介人，直接插手宗教。党的干部、宗教事务管理局官员、或安全力量被直接派进藏人寺庙，上教会讲台讲党的政策，密切监督那些进入维吾尔人、

甚至回民清真寺的人。政府运作的一个新的数据库确认谁是经过“认证”的活佛。中国佛教协会的高层领导中越来越多的人是前政府官员。

政府控制敬拜场所合法登记的努力面临类似于管理神职人员所遇到的障碍。从国际上看，宗教组织需要登记并不少见，甚至在民主国家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在中国，伴随登记而来的各种干预远远超过了一般为人接受的宗教自由国际标准。不仅如此，登记要求以及相关的程序，如财政报告和会计规定，非常复杂和累赘，可能要求提供在过往的政治运动中被销毁的文件。结果是，一些小的寺庙和教堂本来愿意登记，但却无法这样做。

其结果是，很多信仰者不得不通过法外渠道进行学习。

当局制造的其它障碍也导致信仰群体对登记望而却步。一些“家庭教会”很难登记，因为附近有“爱国”教会，相互利益冲突，而政府又不接受不属于三自爱国运动或天主教爱国协会的教会。教会领导人不愿意按照要求报告聚会信徒的名字，担心这些成员会受到监控。近来对官方认可的教会的骚扰表明，登记并不表示不会受到这样的干预，这使得非官方认可的教会更没有登记的积极性。

其结果就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非官方认可的、法外宗教活动空间，不仅包括广为人知的“地下”教会，也包括成千上万未经登记的佛教和道教寺庙。在许多地方，底层官员对这些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在政治敏感期或由比较高层官员领导的运动中，未经登记的敬拜场所极有可能遭到骚扰、突袭、以及财产被摧毁。当局经常采取行动组织为登记场所的活动，将信仰者指向别的地方，如在场所挂表明是否登记的牌匾、禁止捐款、或威胁对敬拜者罚款，如果他们不转而前往官方许可的地方敬拜。

2. “思想改造”：教义操纵以及“再教育”

虽然共产党是无神论者，而且保证要尊重其他人的信仰自由，但是这个政权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资源和强迫手段，影响宗教传授和文本的内容以及个体信仰者的思想。这些措施反映了共产党宗教政策的意识形态取向以及毛泽东主义的残余，常常要求信仰者背弃或违反他们的核心信念。

在好几个案例中，与政府有联系的宗教组织或学者在由政府出资的项目对神学教义进行分解，确定他们认为与共产党意识形态相容的成分，制作出版物和指针，在神职人员和普通信仰者当中分发和推广。

对新教基督徒来说，一场“神学建设运动”着眼于削弱“因信称义”的传统教义，由此鼓励中国新教徒把党国权威置于宗教权威之上。对穆斯林来说，中国在过去十年来对伊斯兰教法进行分析，并规定伊斯兰讲经的内容，大量这样的小册子在全国各地政府许可的阿訇中传播。一个《可兰经》维吾尔文新译本据说加入了新的内容，强调对国家的忠心。2011年发起的一个项目对藏传佛教教义进行重新解释，据说喇嘛寺庙被要求阅读由此制作的小册子。

习近平强调外来宗教“中国化”，在党的“宗教工作”中特别提到其重要性。如此，对宗教教义的操纵在未来若干年看来将会有增无减。

不管是对宗教领导人进行挑选和培训，还是提供朝圣或出国旅行许可，还是获得政府职位或资助，各种形式的“爱国再教育”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西藏的宣传运动过去十年持续扩大，不仅限于寺院，而且扩大到了普通藏人。参加这种“再教育”班的人通常都必须谴责达赖喇嘛。在新疆一些地区，希望获得社会福利或政府公职的穆斯林必须签署保证书，保证不戴面

各种形式的“爱国再教育”是对宗教领导人进行挑选和培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纱，或者在斋月的时候不禁食。天主教领导人被强迫出席非教宗任命的主教所主持的仪式。

在法轮功方面，共产党的政策一直是彻底根除这个群体及其信仰，政府的行动一直集中在“改造”上。这个意识形态再教育过程使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身体酷刑、心理操纵、反复书写“思想报告”，迫使信徒宣布放弃他们的信仰，承诺不再练功。

对中国各地的宗教领导人、寺院、以及普通信仰者来说，政府强迫他们违反宗教信仰，并可能暴力报复不从行为，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两难处境。即使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自我保存，许多被强迫服从于这种要求的人都说他们受到了深刻的心理伤害，他们感到自己背叛了个人信仰、身份认同、以及对精神领导人或神灵的敬拜。即使在再教育学习班结束、或被从关押中释放很久以后，这样的经历仍给他们留下了持久的创伤。很多信仰者后来宣布他们在刑讯逼供下说的话无效，逃离中国以避免再发生类似的经历，或者祈求原谅。

3. 严酷惩罚与致死暴力

对那些回避或拒绝服从官方限制的宗教领导人与信仰者所施加的惩罚有时是最为严酷的，超过对任何形式的异议者的惩罚。法律条款允许对前者判处无期徒刑，法官动辄对显然是非暴力行为判五年以上徒刑，而在几年前，类似的情况是不会受到如此严厉惩罚的。

本报告中所记录的案例包括一名官方教会领导人因为反对省政府拆十字架运动而被判处14年徒刑。一名维吾尔少年因为在手机上观看宗教录像而被判处15年徒刑。⁸ 一名高资历藏人喇嘛被判处18年徒刑，因为警察在查抄他的寺院时发现了达赖喇嘛的画像和录音讲授。一名法轮功学员因为挂“真善忍好”这样一条表达法轮功核心信念的横幅而被判处12年徒刑。⁹ 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还有更多信仰者因为和平表达信仰或异见被判处重刑，包括散发传单、在公开场合祈祷、反对强拆敬拜场所、留胡子等。

信仰犯构成了中国良心犯中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其数量大概成千上万。自由之家研究人员得以确认从2012年11月至今至少1,400例中国公民因行使宗教自由权、或与信仰有关的言论及结社自由权利而被囚禁的案例。这个数字中包括一名中国佛教和尚、几十名新教基督徒、至少75名藏人、400多名被取缔的类基督教门派教徒，以及900多名法轮功学员。这个数字来自于媒体报道、人权组织的记录、以及中国法院判决书，但是考虑到法外监禁以及强迫失踪的规模，这个数字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另外，由于官方统计数字缺乏透明，要从2012年以来因安全和社会滋扰罪行被判刑的数以千计的维吾尔人中区分出非暴力宗教控罪的人数，几乎是不可能的，但这个数字至少有数百之多。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关注，这使得他们尤其面临酷刑和死亡危险。

信仰犯构成了中国良心犯中一个相当大的群体，其数量大概成千上万。

的确，中国安全部队系统性并且肆无忌惮地对囚禁中的信仰者使用暴力，公开暴力镇压抗议者，有时导致死亡。藏人喇嘛、维吾尔穆斯林、和法轮功学员是最有可能面临这种对待的人，近几年每年都有几十例狱中死亡的案例。

本报告所访谈的出狱囚犯提供了殴打、长期戴镣铐、电击、注射不明药物等细节。这些证词显示不同人口与不同地区之间在使用镇压手段上惊人的相似，包括将受害者带到秘密法外酷刑中心，或者把他们“交由”刑事罪犯进行凌辱。

除囚禁外，成百上千的基督徒在过去几年遭到防暴警察的殴打，特别是当他们试图阻止教堂被拆或十字架被拆除的时候。一名牧师的妻子被推土机活埋。在西藏和新疆，警察和其他安全人员在与居民的争执中向后者开枪。这些居民自发地反对官方限制外村敬拜、离家朝圣、或穿戴宗教服饰的做法。这些事件导致伤亡，包括儿童和老年妇女。

4. 经济惩罚，商品化，以及盘剥

鉴于中国社会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经济发展在官员提拔中起的作用，我们也许不应该感到奇怪，我们的研究发现，宗教与赚钱挂钩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有时这些赚钱项目是政府和宗教进行合作的催化剂，但更经常地他们是冲突、惩罚、严重违反信仰者权利的缘由。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严酷压制结束后不久，地方官员就开始视宗教场所为收入来源，“宗教搭台，经济唱戏”这样的标语无疑也是一种促进。¹⁰ 随着人口收入提高，同时大众对精神生活的兴趣提高，国内旅游者与外国游客一道，成为著名宗教景点希望吸引的经济资产，不管是古庙、大教堂、还是穆斯林陵墓。其结果就是翻新工程，新的建筑，门票收入，景区公园，纪念品摊位以及导览成为好几十亿收入的产业。这些活动常常侵入本来属于和尚和当地宗教信仰者的专门空间。

在极度商业化的例子中，一些佛教和道教寺庙，或者一个文化公园里新修的清真寺，彻底成为一个旅游目的地，根本没有神职人员，也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过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场所既是旅游景点，也是宗教活动场所。

在一些情况下，宗教领导人成功地与当地政府官员谈判达成于己有利的条件，分享收入，或开放场所，保留他们的自治，减少矛盾。这样的例子甚至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比如在云南省一个正式命名为“香格里拉”的藏族区域 - 香格里拉是虚构中的人间天堂。

但是，地方官员把商业机制强加于宗教场所的努力，如把一个寺庙圈在一个新修的风景公园收高额门票的做法，常常导致紧张关系，有时还导致抗议。而中国佛教和道教寺庙人员在政治上本来是十分服从的。为了赚旅游钱而对寺庙进行改造的做法也带来了资深和尚、穆斯林圣地访客、藏人朝觐者、以及其他人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做法给普通人造成了妨碍，侵害宗教场所的自治，破坏神圣的宗教仪式。

赚钱动机也直接起到了限制宗教活动的作用。当局向公民提供数额丰厚的报偿（多至\$30,000美元），举报任何被当局认为有问题的宗教活动，从穆斯林妇女带面纱，到为达赖喇嘛上香，到法轮功学员练功。在党国体系内，那些有效镇压某些特定宗教组织和活动的官员会受到提拔和奖励。

惩罚方面，试图躲避或反对宗教限制的信仰者被课以数字可达一个月平均收入的罚款、被威胁失去工作或教育机会、取消社会福利、或者被禁止获得收入，如在藏区禁止他们从挖冬虫夏草获得收入。地方警察知道他们迫害信仰者不会遭到惩罚，因此常常对地下教会进行查抄，或者抓捕法轮功学员以便从他们家人那里索钱，或者掠夺私人财产。其他受害者则经受了非直接的代价，比如近年几十座教堂遭到拆毁，而这些教堂是当地教徒捐钱修建，有些教堂的造价高达数百万美元。

中国当局还把创造收入与惩罚相结合，系统性地盘剥宗教囚犯，谋取经济利益。在中国各地，过去十年无以数计的宗教囚犯（基督徒、藏传佛教徒、维吾尔穆斯林、以及法轮功学员）是监狱强迫劳工的主要来源，他们在苛刻和不卫生的恶劣条件下为中国国内消费以及向外国出口制造大量产品。即使中国在2013年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劳改”以来，仍然有大量宗教囚犯通过司法系统被送到正式监狱，在那里，强迫劳动是经常性的，有时其规模比劳改营还要庞大。

最后，有证据显示，宗教囚犯被法外杀害，为中国欣欣向荣的器官移植业提供器官。许多相关事实、专家分析、和目击证人的叙述都特别指向法轮功学员。¹¹ 尽管中国的死刑数字在减少，

中国当局还把创造收入与惩罚相结合，系统性地盘剥宗教囚犯，谋取经济利益。

图3: 中国各信仰团体遭遇宗教迫害情况一览表

宗教团体 迫害变动趋势 (2012年11月-2016年11月)		趋势说明
基督教新教徒 增加 	自2014年年初，伴随官方有关“西方”价值观威胁和宗教需要“中国化”的论调，地方政府一直在加强措施围堵基督教的传播。作为在中国两个主要基督教当中较大的支派，新教尤其受到移除十字架和拆除教堂运动的影响，其中还包括国家认可的教会领袖受到惩处，受理基督徒案件的维权律师遭到抓捕。	
维吾尔穆斯林 增加 	维吾尔人占人口多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宗教管控持续深化和扩大。先前新疆地区的一些非正式或地方性限令，如有关宗教服饰，已经在自治区和全国层面成为成文法律。当局还开展了新的运动来更加严密监控智能手机的使用，强迫商店卖酒，而安全部队射击维吾尔平民的现象也变得更加普遍。	
回族穆斯林 略有增加 	随着官方和公众日益担忧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受伊斯兰教鼓舞的暴力行为的威胁，回族穆斯林自2012年11月以来面临一些更加严格的限制和伊斯兰恐惧症。在若干省份，对儿童宗教学习的禁令执行的更加严格，展示清真食品的标志受到限制，萨拉菲派回族穆斯林受到镇压。	
藏传佛教徒 略有增加 	习近平主席基本上延续了他的前任胡锦涛的打压政策和运动，并深化和扩大了某些管控措施。新的手段包括惩罚那些协助自焚的人，取消先前允许的节日活动，增加对私人宗教活动的干预性限制，并且更加积极地篡改藏传佛教教义和操纵宗教领袖的遴选。	
汉传佛教徒 保持不变 	习近平延续了胡锦涛时代的政策，为汉传佛教创造一个相对较少迫害的环境。他的行为和言谈把汉传佛教描述为在国内外实现党的政治经济目标的一个愈发重要的管道。在一起罕见的案件中，一名汉传佛教僧人在2016年因政治罪名被判入狱。	
道教徒 保持不变 	中国领导人一直把中国本土的道教看成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工具，用来在传统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打造政权合法性以及与台湾的道教信徒改善关系。	
天主教徒 略有降低 	尽管有些天主教教堂十字架遭到强制拆除，但是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自2013年以来有所回暖。目前有超过40名主教空缺，双方似乎即将就管理中国的主教任命问题达成一项突破性的协议。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减少对地下天主教徒的打压，一些著名的教会人士依然持怀疑态度。	
法轮功修炼者 略有降低 	中国各地的法轮功信众继续遭受广泛和严重的人权侵害。不过，这种打压在有些地方似乎有所下降。习近平主席没有明确表示将有计划改变中共对法轮功的政策。但是作为习近平反腐努力的一部分，前安全部门头子周永康和其他涉及反法轮功运动的官员遭到监禁，再加上法轮功追随者努力感化和劝阻警察对他们的迫害，这些因素已经产生了正面影响。	

志愿捐献器官人数相当小，但是却有大量的器官供应，移植等待期较短。考虑到这种情况，大量维吾尔年轻男性失踪、维吾尔政治犯羁押后抽血的事实、以及藏人与维人在羁押期间神秘失踪的报告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和注意，这些人口也有可能是非自愿器官收获的受害者。¹²

注解

1. “中国焦点：习近平要求改善宗教工作。” 新华社，2016年4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6-04/23/c_135306131.htm。
2. 老子《道德经》 Stephen Mitchell 编辑 (纽约: 哈珀柯林斯出版社, 1994年)。
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1982年3月31日。 <http://www.sara.gov.cn/zcfg/zc/497.htm>. 英语翻译可以在这里找到: Donald MacInnis, 今日中国宗教: 政策与实践 (纽约: 奥比斯出版社, 1989年), 8-26页, https://www.purdue.edu/crcs/wp-content/uploads/2014/08/Document_no_19_1982.pdf。
4. “中国焦点：习近平要求改善宗教工作。” 新华社。
5. 本报告不包括对儒家的考察。儒家在近年升温，但是它更多地被看作是一套社会与伦理哲学，而不是一种宗教信仰。另外本报告的研究范围也不包括比较小的信仰群体，如犹太人、巴哈伊信仰，后者在中国不时遇到限制。
6. 本文以及接下来的部分中有关变化中的宗教管控机制的研究结果是根据本报告五章中对七个宗教群体的详细研究而得出的。脚注包括注释、引语、或在报告的其它部分没有讨论到的要点。本报告的全文以及支持性来源可在自由之家网站找到：www.freedomhouse.org。
7. André Laliberté, “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政治化：有选择性的回索,” 《亚洲研究》 69, no. 1 (2015): 185-211页, <https://www.degruyter.com/abstract/j/asia.2015.69.issue-1/asia-2015-0010/asia-2015-0010.xml>。
8. Eset Sulaiman, “警察在新疆加强对维吾尔人智能手机用户的检查,” 自由亚洲电台, 2016年1月8日, <http://www.rfa.org/english/news/uyghur/police-increase-checks-of-smartphone-users-in-xinjiang-01082016133532.html>。
9. 黑龙江省方正县人民法院, “李长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实施法律实施一审刑事判决书” 中国裁判文书网, 2015年11月23日 <http://wenshu.court.gov.cn/content/content?DocID=a0fe2131-e19f-4d13-914f-629771e8686d>。
10. 华春雨, “国家宗教局：处理好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宗教界权益的关系”, 新华社, 2012年10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0/24/c_113484955.htm。
11. 欲了解现有证据，请阅读本报告法轮功一章：www.freedomhouse.org。
12. 比如说，一名2011年从乌鲁木齐一家监狱获释的维吾尔穆斯林向自由之家详细讲述了对监狱里维吾尔政治犯和宗教犯每月抽血的情况，汉人犯人则不需要抽血。他和两名藏人受访者都讲到宗教犯在狱中神秘死亡的事例。这是2016年10月对一名目前居住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的采访。他希望匿名。

关键的宗教控制手段 (2012年11月 - 2016年11月)

#	控制	汉传佛教 /道教	基督教 (新教 + 天主教) ^a	藏传佛教	伊斯兰教 (维吾尔人) ^b	法轮功 ^c
总数		8/24 (33%)	18/24 (75%)	22/24 (92%)	21/22 (95%)	18/18 (100%)
1	“爱国协会”的管理	●	●	●	●	n/a
2	对宗教领导人招募/训练的控制	●	●	●	●	n/a
3	封衔/培训的数量	●	●	●	●	n/a
4	敬拜场所的关闭/摧毁	●	●	●	●	n/a
5	国家认可的宗教领导人/僧侣被判监	●	●	●	●	n/a
6	未被国家认可的宗教领导人/僧侣被判监		●			n/a
7	对教义进行干预/操纵		●	●	●	●
8	禁止核心宗教教义		●	●	●	●
9	学习宗教文献会遭受惩罚		●	●	●	●
10	宗教庆典受到限制或惩罚		●	●	●	●
11	普通信仰者被监禁	●	●	●	●	●
12	50名以上的信仰者被监禁		●	●	n/a	●
13	500名以上的信仰者被监禁				n/a	●
14	因网上宗教活动而被监禁		●	●	●	●
15	限制儿童的参与	●	●	●	●	●
16	政治“再教育”运动		●	●	●	●
17	普遍存在的酷刑			●	●	●
18	法外杀害		●	●	●	●
19	10个以上法外杀害的案例			●	●	●
20	新的限制性的法律变动			●	●	●
21	对行动/护照发放的限制			●	●	●
22	在国家媒体抹黑		●	●	●	●
23	经济剥削	●	●	●	●	●
24	网上审查宗教交流			●	●	●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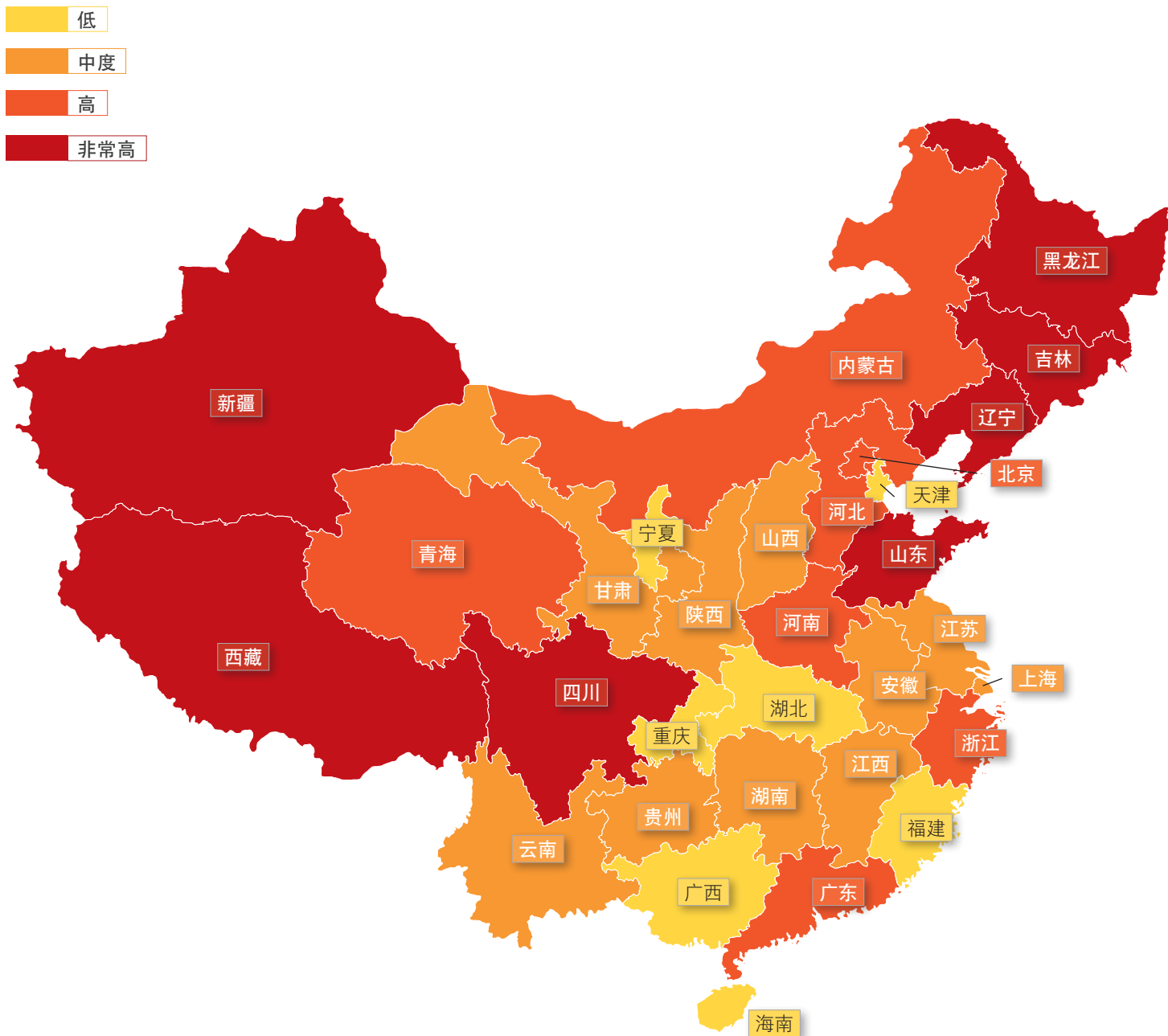
a. 基督教徒被监禁的人数也包括属于被取缔的类基督教派别的个人。

b. 由于缺乏足够清楚的数据，对回族穆斯林的待遇未包括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去评估是否有50或500以上的维吾尔人被监禁。

c. 好几种形式的控制措施都不适用于法轮功，因为它既不是一个正式有组织的宗教，也不是官方认可的宗教，缺乏任命的神职人员、敬拜场所、以及获得国家认同的领导人。

地图：各省份宗教迫害情况 (2012年11月 - 2016年11月)

中国的许多宗教控制措施是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2012年11月以来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以及省级直辖市均有有记载的迫害案例，但是迫害的程度以及针对的主要群体因地区而不同。



注：对各省份宗教迫害情况的评估是根据几个来源做出的，包括从中国法院判决书中获得的迫害和拘押案例数据、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中国政治犯数据库、以及人权观察和对话援助协会的报告。

I: 汉传佛教与道教

迫害严重程度:

汉传佛教

低

道教

非常低

迫害变动趋势:

汉传佛教



保持不变

道教



保持不变

主要研究结果

- 1 复苏:** 汉传佛教和道教过去三十年从几近灭绝经历了长足复苏, 但它们的规模和影响力与中国共产党建政以前相比, 仍显失色。汉传佛教以约一亿八千五百万到两亿五千万的信众人数, 为中国最大的已制度化的宗教。
- 2 干涉控制:** 大量规章和官僚控制确保两宗教在政治上的驯服, 然而, 政府不当限制在其他国家视为例行性的宗教活动。其中不切实际的寺庙登记条件、不经常性批准传戒、以及官方干预寺庙行政等控制手段, 严格限制了一般民间出家人和信众的宗教信仰。
- 3 习近平治下:** 习近平主席在宗教政策修辞上做了些许调整, 但基本上仍继续前任胡锦涛的政策。对中共领导人而言, 汉传佛教和道教逐渐被视为实现党在国内与国际上政治和经济目标的重要渠道。2006年一位汉传佛教僧人罕见地遭到政治指控而被判刑。
- 4 商品化:** 开发寺庙以获取数十亿观光产业商机, 已成为政府、僧人、和信众之间主要矛盾点。
- 5 宗教界应对:** 宗教界领导和僧众愈发果断地采取免费或低廉的寺庙门票, 在阻挡商业化侵袭上, 时常有所进展。



在浙江省一个景区，游客们穿梭于观音像下。这些环寺庙而建、收门票的景区日渐成为地方佛教领袖与政府紧张关系的来源。

图片来源：Kuei-min Chang

“佛教理想与中国梦的价值契合、会通……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基础。”

—方立天，佛教哲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2003 ¹

“很多地方政府把寺庙看作是地方收入来源。市政府开发周遭地区要把寺院圈起来收门票。但是师父绝不会同意。他说那天我们得靠收门票生存时候就是我们把寺院关起来的时候。”

—江苏省寺庙僧人 ²

II: 基督教

迫害严重程度:

天主教

中度

基督教新教

高

迫害变动趋势:

天主教



略有降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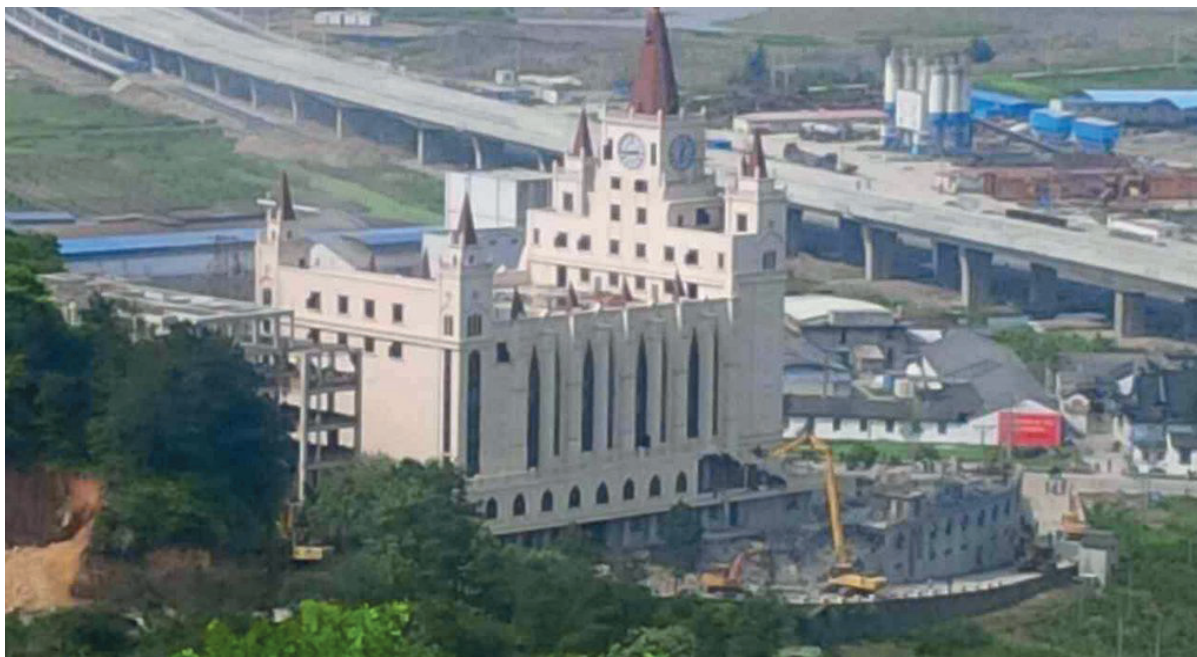
基督教新教



增加

主要调查结果

- 1 信仰复兴:** 自1980年以来, 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迅速扩张, 到2014年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据估计分别达到5800万和1200万, 其中注册和非注册信众的人数基本各占一半。城市中受教育专业人士和富裕企业家的信仰人数显著增长。
- 2 主要政治管控措施:** 中国当局一直试图对基督徒进行管控——鼓励有时甚至是强制他们加入国家认可的教会。这些教会隶属于各种“爱国教会”, 并受“政审合格”的神职人员领导。那些因神学或其他实际原因而拒绝在国家认可的教会登记注册的宗教领袖和信众, 将遭遇礼拜活动场所被查封的风险, 并会面临拘禁、殴打、失业甚至入狱。
- 3 习近平治下的基督教:** 自2014年初以来, 在官方有关“西方”价值观和宗教“中国化”的一片声浪中, 地方当局采取了更多手段来遏制基督教的传播。他们使用了一些以前甚为罕见的打压措施, 包括把矛头指向政府认可的教会及其领导人、抓捕受理涉及基督教案件的人权律师、阻扰圣诞节庆祝活动等等。在最近对一些被政府认定为“异端”的类基督教团体的打压行动中, 有超过400名宗教领袖和信众被捕入狱。
- 4 十字路口的天主教:** 北京和梵蒂冈之间的关系似乎即将取得积极突破。据报导, 双方正在致力于达成一项协议, 事关对于中国一下子出现的超过40个主教职位空缺, 如何任命教皇和共产党双方都能接受的主教。
- 5 回应与抗争:** 日益严厉的打压已经引发了来自教会领袖和信众的强烈反应, 其中包括一些来自官方“爱国教会”的颇具影响力的人士。基督徒们发表联名信、抵制官方庆典仪式、举行室外礼拜、声张他们的合法权利, 甚至用自己的身体阻挡官方拆除十字架。很多基督徒也采取了更为细致的战术来削减政府管控的影响, 比如将传教活动与慈善活动相结合、参加私人组织的山区讲习班 (mountainside trainings)、培养与当地官员的合作关系从而减少遭受迫害的可能性。



浙江省三江教堂是一个受政府认可教会的财产。这是三江教堂2015年4月被拆毁前和被拆毁后的情景。

图片来源: Shanghaiist/China—in His image (英文博客)



“要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

—习近平在2016年4月的讲话 ¹

“我会强烈要求[省民宗委]…立刻停止此类撕裂党群关系的拆除十字架的谬行。”

—浙江省基督教协会发表于2015年7月的一封信公开信 ²

III: 伊斯兰教

迫害严重程度:

回族穆斯林

低

维吾尔穆斯林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回族穆斯林

 略有增加

维吾尔穆斯林

 增加

主要调查结果

- 1 复兴与发展:**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2100万信徒，在过去10年有了明显的发展。回族穆斯林新建了数以千计清真寺，而很多维吾尔人通过宗教活动来表明自己不同于占人口多数汉人的独立身份认同。伊斯兰教中极端保守的萨拉非派的影响力也有所扩大，甚至吸引了少数汉人皈依。
- 2 分而治之:** 中国对穆斯林的待遇，随着不同民族和地理位置有着明显的差异。回族穆斯林在实践伊斯兰信仰的核心内容上，比维吾尔人要享有更大的余地，比如一日五祷、斋戒月斋戒、去麦加朝圣或是佩戴头巾等等。从事这些活动的维吾尔人则很可能丢掉工作，遭到罚款，甚至被捕入狱。
- 3 习近平治下:** 自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中共领导人之后，回族和维吾尔人都面对越发严格的限制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府管控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尤其变得更加深入和广泛。过去一些在新疆的非正式和地方性的限制措施—比如在宗教服饰和儿童教育问题上一已经变成了整个地区和全国性的法律规定，当局还开展新的运动来更加严格地监控智能手机的使用和强制商家卖酒。
- 4 日益增加的暴力活动:** 政府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和粗暴的执行措施，与日益增多的暴力冲突和维吾尔人预谋发动的袭击事件有着密切关联，这些袭击行动目标针对警察、亲北京的宗教领袖和平民。中央政府一直以来把“维稳”放在首要位置，并开展了一场“严打”运动，给更多警察配备了武装，对即便是和平的宗教活动也采取严厉惩罚。安全部队向维吾尔平民开枪的事件变得更加普遍。
- 5 经济奖惩:** 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优先利益导致更加严厉的镇压，但同时也鼓励了部分政府部门在一些项目上，投入资金推广伊斯兰教或有关货物的出口。新疆的政府当局大量利用经济奖惩手段以强化宗教管控。



甘肃省临夏一座回穆斯林清真寺。临夏有“小麦加”之称，那里对伊斯兰的限制比新疆要宽松得多。

照片来源：维基媒体

6 调适与抗争：回族穆斯林有调整他们的宗教活动以适应汉人思想，并通过现存的政治体制来影响政策制定的传统。面对更加限制性的环境，很多维吾尔人选择暗自躲避官方管控，获取未经认可的宗教出版物，私下坚守他们的信仰，或是拒绝参加官方的庆祝活动。还有些人采取更具反抗性的举动，比如蓄胡子、在禁止佩戴头巾的场所佩戴头巾，或是当警察试图执行这些粗暴的规定时，与之对抗。

“2009年以后，一切都变了。现在的规矩是，如果我去你家一起读《古兰经》，一起祈祷，政府发现了，你就得进监狱。”

—巴娜，来自新疆的维吾尔妇女，现居美国，2015年⁵

“这一（回族小女孩背诵《古兰经》的）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一片哗然……甘肃省教育厅强烈谴责这种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行径，要求各级教育部门……严禁各种宗教活动进校园。”

—甘肃省教育厅，2016年5月⁶

IV: 藏传佛教

迫害严重程度:

藏传佛教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藏传佛教



略有增加

主要调查发现

- 1 复兴与发展:** 在“文革”的残暴破坏之后，藏传佛教有了显著复兴。在过去十年，它在中国各地的城市汉族精英中赢得了数百万新信徒，这些人与大约600万藏族人一起加入了这个传播广泛的宗教信仰。
- 2 严密管控:** 中国当局对藏传佛教信徒的宗教活动施行严格控制，尤其当其事关对流亡的达赖喇嘛的虔信——这是很多信徒的核心原则。官方人员派驻寺院、无处不在的监控、例行的“再教育”运动、对旅行和通讯的限制、限制政府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各种规章制度，对绝大多数寺院僧众和很多世俗信众都产生了影响。不过，针对不同的地理区域和不同藏传佛教派别，管控措施的落实程度有所不同。
- 3 武力打压:** 在藏族地区，中国安全部队会快速采取强制措施镇压他们认定的宗教不同意见，包括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真枪实弹。人权团体和媒体的报导显示，自2012年11月以来，至少有321名藏人因涉及宗教行动或意见表达而遭到拘禁，其中75人被判处徒刑。³ 每年都有若干人在被警方拘押期间丧生。⁴
- 4 在习近平治下:** 习近平主席基本上延续了胡锦涛时代的政策和打压运动，并且深化和扩大了某些管控措施。一些新的管控措施增强了政府与僧俗信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对协助自焚者判罪，取消过去允许的节日活动，加强对私人宗教活动的粗暴限制，采取更加主动的措施篡改藏传佛教教义和操纵宗教领袖的传承。
- 5 经济的胡萝卜和大棒:** 政府采取各种不同的奖惩措施，鼓励地方官员使用强制性而非合作性的方法来处理与藏传佛教界的纠纷。经济手段也逐渐地被用来作为一种集体处罚方式，用以吓阻抗议行动或对宗教打压的反抗。这种措施常常会影响整个家庭或村庄的生计。



2016年，在强拆前和强拆中的著名色达五明佛学院。据报中国当局试图降低来此学习的藏人和汉人的人数。

图片来源：维基媒体 / Jimmy Lee, Contact 杂志

6 韧性与抗争：尽管遭受了超过20年的镇压，事实证明藏人私下对达赖喇嘛的虔信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中国官员和媒体对达赖喇嘛持续不断地斥责和污蔑，是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中，最令藏人反感的部分之一。强迫僧俗信众诋毁达赖喇嘛的运动的扩大，一直是挑起抗议的关键因素，其中包括2009年以来的（超过）140起自焚抗议事件。也有很多藏人采取较为细致的抗争方式，创造一些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受到禁止的宗教活动或分享信息。



“共产党才是老百姓真正的活菩萨。”

—张庆黎，前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2007年3月¹

“政府的宣传是没用的，人人都知道这些是假的。（达赖喇嘛）尊者就是所有藏人的一切。在西藏，所有人都希望有一天能见到尊者。”

—尼玛拉姆，最近来自四川的流亡难民，2016年8月²

V: 法轮功

迫害严重程度:

法轮功

非常高

迫害变动趋势:

法轮功



略有降低

主要研究结果

- 1 法轮功的存续:** 尽管共产党已经对法轮功进行了长达17年斩草除根式的镇压, 中国仍然有几百万人继续修炼法轮功, 而且很多人是在镇压法轮功开始后才开始修炼。这显共产党镇压机器是失败的。
- 2 持续的大规模迫害:** 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广泛受到监控、任意羁押、判刑、酷刑, 他们还是被法外处死的高危群体。自由之家独立证实了, 从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期间, 有933起法轮功学员被判处上至12年徒刑的案例, 原因是行使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这些案例仅仅是法轮功被判刑的部分案例, 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据信被关押在不同的监狱和法外拘留场所。
- 3 镇压中的裂缝:** 尽管对法轮功的镇压仍然持续, 但在一些地方, 打压似乎有所减缓。习近平没有明确表示其有意扭转对法轮功的政策, 但是和镇压法轮功连在一起的周永康等官员在反腐中遭到清算及判刑, 加上法轮功学员坚持不懈劝导警察不要镇压他们, 看来起到了一定作用。
- 4 经济剥削:** 中共当局每年投入数以亿计的资金镇压法轮功, 同时又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利润丰厚的经济上的掠夺, 包括向他们索取钱财、监狱强迫劳动等形式。有证据显示有大规模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 用于器官移植手术, 这种情况仍然持续进行中。
- 5 应对与抵抗:** 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多种非暴力策略应对镇压。他们尤其注重与警察和公众分享法轮功信息、违反法轮功修炼者人权事件的信息、以及其它反驳国家宣传的内容。近年来, 中国有越来越多的非法轮功修炼者也加入了这些努力, 如人权律师、家庭成员和邻居等。



1998年法轮功修炼者在广州公开打坐，1999年中国共产党取缔了法轮功。这样的集体打坐仍然遭到禁止。

图片来源：明慧网

“对法轮功的镇压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共产党发起的】最糟糕的宗教迫害的例子。”

—研究中国宗教状况的著名学者，渥太华大学教授André Laliberté，2015年。¹

“抓人的命令持续来自高层，但有时公安局的人会挡回去，说这些人只是为了健身而练功。”

—一名中国人权律师，2013年。²

建言

本报告所描述的种种事态发展，给中国和国际社会既造成了损失，也提供了机遇。人身伤害、家庭破碎、生命损失几乎每天发生，但是人们也发现了信仰宗教、减少迫害和利益同胞的新途径。

将近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口受到中国政府宗教政策的影响。在这个群体中，按照本研究报告的评估，有估计8千万到1亿2千万的信众属于遭受“严重”或“非常严重”迫害的信仰团体，这凸显了他们迫在眉睫的困境。

如本报告概论部分所述，党国体制与宗教团体关系的远非仅仅局限于一特定的政策领域，而深刻地影响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一个愈发相互连结的世界，双方的互动及其后果影响超越中国国界。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实现法治、提高言论自由、减少腐败、保障社会稳定和构建真正的民族和谐方面，中国当局没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除非他们能开始放松宗教管制、终止官员免责权和释放宗教犯。事实上，持续不断的打压反而可能违背中共、外国政府和国际人权团体所共同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

与此同时，尽管本报告力图对中国的宗教复兴、打压和反抗提供一个综合性评估，但是有关这个议题还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调查。

有鉴于此，自由之家敦促中国政府、外国决策者、国际民间团体和宗教组织、新闻记者和研究人員立即尽可能地采取下述建议措施：

A. 对中国政府的建言

- **采取更加包容的管制架构。**在法律框架内，采取确立宗教场所的法人地位和放宽登记注册规则等措施，扩大宗教活动空间。一个可能的变化是取消宗教场所必须隶属于“爱国协会”的规定，从而可以使更多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佛教和道教寺院庙观，以及像法轮功这样的非正式团体得以合法与公开运作。
- **放开对特定人群参加宗教活动的禁令。**解除对儿童宗教活动的限制，让有关规定符合中国已经批准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解除对新疆和西藏地区一般信众宗教活动的限制，尤其是公务员和教师这样的政府雇员，让他们可以从事伊斯兰教“五功”和藏传佛教日常主要信仰活动。
- **撤回那些严重限制宗教信仰空间的武断决定。**中共的若干宗教政策法律基础薄弱，形成程度不一的打压，并导致了信众的强烈反抗。中共应当考虑撤回这些决定。例如：

- 允许藏人尊崇作为宗教人物的达赖喇嘛。停止在国家媒体对他进行诽谤，停止混淆宗教信仰与政治分裂主义，停止惩罚那些拥有达赖喇嘛画像和教导资料的信众。
 - 废除对法轮功的禁令，裁撤凌驾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
 - 停止浙江省拆除教堂十字架的运动，允许礼拜场所重新安放被拆除的十字架。
 - 解除对信众的国内外旅行限制，包括宗教学习或朝圣。解除对新闻记者和研究人员前往宗教冲突地点的限制，例如维吾尔和藏人聚居区。
- **释放所有宗教犯。**释放那些仅仅因为和平行使宗教自由和宗教表达权利而遭到监禁的所有个人，包括那些记录在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CECC）《政治犯数据库》中的人士。在未来涉及宗教信仰的案件诉讼过程中，给予法官更大的权威来区分和平宗教活动与暴力行为。
 - **采取措施停止官员免责权。**按照广泛的司法改革尝试，鼓励法官在涉及宗教违法的案件中，拒绝采纳那些透过酷刑所获得的证据。调查所有酷刑指控，以及所有在被拘押期间或在安全部队手中的可疑死亡案件，起诉本报告所提及的所有非法致死案件的相关责任人。信守中国作为《反酷刑公约》成员国的承诺，落实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相关建议。
 - **停止利用囚犯进行器官移植。**终止所有利用囚犯进行器官移植的行为，促使建立独立自主的国际稽核机制，审核器官来源，以证明器官捐赠体系是完全自愿和透明的，而非牺牲死囚犯和宗教犯。为调查这一问题的国际专家提供签证、旅行自由和取得医疗档案和与相关人员对话的途径。

B. 对美国、欧洲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建言

- **把宗教自由作为与中国政府关系的优先考虑事项。**鉴于中国侵害宗教自由的规模和严重性，以及世界各国关注这一问题的共同信仰者，宗教自由问题值得民主国家政府在与中国官员交往时予以特别关注。
 - 就落实上文所述建议向中国政府施压。
 - 确保政府各级官员，包括总统或首相，以及各个机构在与中国官员们所有的会谈中既要提出总体上的人权问题，也要特别提到宗教自由问题（在美国，这应该包括来自白宫、国务院、财政部、美国国际发展署和国会的各级官员）。
 - 任命中国问题专家担任宗教自由大使。中国政府是全世界最恶劣和最无孔不入的宗教自由侵犯者之一，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老练的外交谈判者。根据过去的经验，那些和中国打过交道的受委任者能够更有效地接触中国官员并提出这些敏感问题。
 - 在提出这些问题时，要结合其他重要的人权问题（比如司法改革或言论自由），并且要提到所有相关的宗教团体，慎选语言，避免无意间强化中国政府正当化其宗教限制和诽谤信众的论调。
- **吸引人们关注侵权事件以及这些事件与他国之国家利益的关联。**
 - 强调那些因宗教信仰而遭到监禁或迫害的具体个案。前政治犯不断提及当外国官员提出他们的案件时，他们在狱中的待遇会有所改善，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由于这样的干涉而获释。
 - 发表公开宣言和私下外交行动，实时针对当地发生的事件作出反应。
 - 在国会采取行动，包括举行听证会、在议会发表演说、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官员递交公开信以及起草有关立法草案。

- **充分利用前往中国访问的机会。** 在访问中国之前，各国官员（包括总统、首相、其他内阁成员、部长、副部长、联合国特派员、大使和议员等等）应该做到以下事项：
 - 与近期逃离中国的宗教信众会面，聆听他们对宗教迫害的第一手记述，了解紧迫问题。
 - 在筹备与中国省市级官员会面时，利用可以公开获取的资源确定当地宗教自由状况和那些遭遇迫害的当地信众的姓名。这些资源包括自由之家这份报告的附件地图、美国国会中国问题委员会的《政治犯数据库》以及各人权团体的个别案例报告。
 - 在访问期间或之后，如果该地区宗教迫害有所增加，做好准备进行有力的回应，例如2016年在20国峰会前后出现的基督徒遭迫害案件。

- **加强对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惩处。**
 - 对于那些对宗教信众进行虐待、酷刑和迫害的官员**实施禁止入境和财产制裁**。很多中国官员因私人事务前往美国或欧洲旅行，并在国外银行账户上拥有资金。通过拒发护照和冻结海外资产来惩罚作恶者是一个有效途径，可以确保这些人受到正义的制裁并防范未来的施暴者。在很多国家，包括美国，这些措施的实施不需要制定额外的法律。例如，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IRFA），对于那些曾经从事“特别严重的侵犯宗教自由”行为的外国官员以及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美国政府可以拒绝他们入境。
 - **立即搁置或取消中央和地方或是省级官员的正式访问或交换计划**，以响应严重的宗教迫害事件。
 - 对于美国政府，要按照《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将中国继续列为“特别关注国家”（CPC），并根据这项法律施加额外惩罚**。自1999年以来，中国每年都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即“从事或默许系统性的、持续的恶性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美国行政部门通常选择不去按照《宗教自由法案》实施广泛的经济制裁。

- **实施多边行动**
 -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民主国家应当参照最近一份有关中国的广泛人权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一份联合声明谴责中国对宗教信众的迫害以及部分宗教团体日益恶化的处境。有些国家或许有选民对这些问题感兴趣，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通常不会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其中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外交部门应该鼓励这些国家参与多边行动。
 - **各国议会间的行动方案**：民主国家的议员们应该就中国宗教自由议题组织进行联合访问，制定共同决议，发表公开声明或信件。

- **资助各类有助于中国宗教信众的项目、政策和研究。**
 - 提供短期紧急资金援助，让宗教信众能够得到医疗服务，获得法律援助，离开中国或满足其他紧急需求。
 - 为那些被迫无限期逃离中国的个人提供必要的长期资金援助，他们当中很多人由于其难民身份而无法工作。
 - 捐款人应该支持那些挑战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计划，包括那些因安全考虑而设在中国境外但影响中国当地情况的计划。
 - 政府机构、跨部门专项工作组、非政府组织、新闻记者和学者们从事的研究活动都需要资助。优先考虑事项可包括对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完整记录以及下文所列举的其他领域的调查项目。

- 抵制北京输出迫害宗教少数民族群的企图。
 - 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尤其在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层级。
 - 确保全面保护宗教团体中的运动人士之结社和言论自由，尤其在中国高层官员访问期间。
 - 抵制遣返宗教难民回中国的压力，近年来一些政府一再实施这一令人不安的做法，尤其在南亚和东南亚。

C. 对国际民间社会和宗教组织的建言

- 「认领」中国教友，作为舆论和道义支持。中国境外的宗教机构和信众团体应当“认领”那些经审查属实的宗教犯，为那些和他们享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受害者提供精神的、舆论的、甚至是资金上的支持，或是通过对其他宗教的成员予以同样的支持从而达成各宗教团体间的团结一致。这样的协助可以包括每周为受害者进行祷告、给外国政府和中国官员写信、为被拘押者家属募集金钱、物资、或所需服务。
- 整合各自为阵的维权努力，共享最佳维权方法。尽管各种专门化的人权倡导是重要的和有效的，但是各种不同的团体可以通过在有共同利益的各种主题上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影响力的最大化。支持基督徒、藏人和维吾尔人的海外团体与中国境内的法轮功追随者应该开展协作项目和维权运动。他们还应该分享那些有效减少国内教友遭受迫害的策略，例如培训草根信众如何在与官员对话时，声张他们的合法权利，或是由海外活动人士致电警方、法庭和检察官，敦促他们释放被拘押的宗教人士。
- 改善对宗教犯和施害者的记录。若干人权组织和海外网站对中国的宗教信众遭拘押和囚禁案件进行监督，但是这些监督努力在不同宗教团体间是不完全和不均衡的，有时还缺乏国际可信度。有些计划方案已经开始对从事恶性虐待活动的中国官员进行身份确认，但是他们的数据库也同样千差万别，可能需要独立查证，而且这些数据不全部是英文的。国际民间社会团体应该填补这样的空缺，并充分利用能够获得的中国政府数据，包括法庭判决，以补充来自草根信众的报告。一个联合数据中心能够整合、研究和公布这些信息。更详实记录犯人和施害者将降低他们的匿名性，改善被拘押者在中国的境遇；给决策者、民间人权倡导团体、学术交流、商业交易和培训项目提供相关信息；强调重大侵害人权事件中的个人责任；给中国镇压机关中的成员提供部分吓阻力。
- 就强制劳动和器官摘除进行联合调查。这两个议题影响到多个信仰团体和经济部门，涉及强大的跨国元素和严重的人权后果。因此，由来自不同专业领域——包括特定的宗教或民族群体、刑事司法、劳工权益和医学——的研究者们进行的联合调查将有助于这两个议题的研究。有关宗教犯被迫从事劳动的调查应当聚焦于2013年废除“劳教”制度以后发生的变化，并设法识别中国良心犯加工销往境外的产品，这类产品的进口在有些国家是非法的。对滥用器官移植的调查应该追踪中国不断扩大的器官移植产业中的器官来源，以确定这些器官在何种程度上是违反捐赠人意志，摘取自不同的宗教犯群体，以及党和政府官员们的卷入程度。
- 为上述及其他计划提供非政府资助。私营基金会、个人慈善家和捐赠机构应当为上述各项提议提供资助，还应该为旨在扩大中国的宗教自由、记录侵害人权案件和反击打压势头的其他各种计划提供资助。鉴于很多团体在中国所面临的危险以及一些宗教组织不正规的组织结构，捐赠者应当建立起一个具有灵活性的资助机制，包括支持那些设立在中国境外但是对境内的情况能产生直接影响的计划。

D. 对学者与新闻记者的建言

- **审慎选择语言和数据源。**当写作有关中国宗教问题时，学者和记者们需要留心他们对官方言论的采用，以免无意中为那些误导和诽谤受迫害群体的宣传背书。他们应该就这些议题征求各种不同的数据源，包括难民们的记述和海外团体的研究成果。尽管各种数据的可信度各有不同，但是在身居中国境外的受迫害宗教团体成员中，以及他们的外国支持者当中，有很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可靠的目击证人和有价值信息的提供者。认为他们的观点或作品存在固有的偏见而弃之一旁，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并且非常可能限制国际社会对事件真实情况的理解。

- **为进一步的研究开发新课题。**除了上文中提到议题，研究和调查报告的主题还包括：
 - **宗教政策：**在2016年实施新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之后，在省级和地方层级，在宗教政策领域和宗教迫害方面发生的各种变化。
 - **经济紧张关系：**尤其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下，政府的财政诱因和经济开发遭遇宗教限制和抵制，这种状况是否会增加汉传佛教和道教领导人与官方的紧张关系。
 - **天主教：**在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就主教任命问题显然即将达成协议的背景下，官方与非官方教会受到的不同待遇。
 - **基督教新教：**中国政府对付新教教会的手段变化，包括对政府认可的礼拜场所日益增加的骚扰，在何种程度上会扩散到浙江省以外的地区，并影响先前政教关系相对宽松的其他地区。
 - **藏传佛教徒和维吾尔穆斯林：**在西藏和维吾尔地区对宗教活动的限制如何影响日常生活，这种侵犯行为是否在持续增加，当地民众作何反应。
 - **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境内处境的变化，包括持续中的大规模侵权现象，政策执行力度不均衡的趋势，以及对江泽民提起法律诉讼的运动。
 - **新兴宗教运动：**针对新兴或是比较小的宗教团体可能的迫害，由于他们不广为人知和孤立，常常不在外国观察者的视线之内。



自由之家是一个非营利、
无党派机构，支持民主变
化，监督自由，倡导民主
和人权。

1850 M Street NW, 11th Floor
Washington, DC 20036

120 Wall Street, 26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5

www.freedomhouse.org
facebook.com/FreedomHouseDC
[@freedomHouseDC](https://twitter.com/freedomHouseDC)

202.296.5101 | info@freedomhouse.org
